

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？

●評布里辛斯基的共產主義續存論與敗亡論●

彭錦鵬*

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. Huntington, Political Power: USA / USSR, New York: The Viking Press, 1963.

Zbigniew Brzezinski, The Grand Failure: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, New York: Charles Scribner's Sons, 1989.

共產主義是廿世紀人類政治生活中，影響最廣泛深遠的意識型態。尤其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，在冷戰、柏林圍牆、韓戰、人造衛星、越戰、阿富汗戰爭等國際大事中，呈現出左右國際政治走勢的絕對力量。共產主義的全盛期，主宰了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命運。共產主義究竟是會永久存續下去，或是歸於滅亡，成為歷史的陳跡，當然是政治學者爭辯不休的課題。

布里辛斯基在一九六三年與杭廷頓合著的「政治權力」一書中，對於蘇聯政治體系的評價是肯定的，甚至於認為探討蘇聯的「民主化」是沒有意義之舉。而他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後，則見風轉舵的否定共產主義，認為它將在本世紀中「一敗塗地」(The Grand Failure)。究竟是昨非今是，或昨是今非呢？這是否為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」的最佳範例呢？

*彭錦鵬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

布氏在一九六三年「政治權力中」對於美蘇兩國的斷語是：

「美國與蘇俄的政治體系，各以其不同的方式，都是極為成功的。因為這兩種體系都是成功的，他們也就不可能有很劇烈的改變。」

布氏在一九八九年「一敗塗地」則對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，作出完全不同的評斷：

「簡言之，蘇聯共產體系的致命僵局是，其經濟成就必須以政治穩定的代價才能換取，而其政治穩定則唯有付出經濟失敗的代價，才得以維持。」

政治學者，就正如歷史學者一般，不免常作出事後之見的判斷，也就是在國際事件發展的大環境中，無形中被某些因素感染或強烈的影響，以致作出在不同時期對同一政治現象有着不同的評價。布氏一九六三年成書之際，蘇俄的國際力量正大幅擴張中，而因為史密尼克人造衛星的發射，也使美國有着自嘆不如的感慨，與奮發圖強的旺盛企圖。在這時期，布杭兩氏勇於提出對匯合論（convergence theory）的反駁論調，並強烈主張蘇俄政治體系的穩定發展，勿寧是容易瞭解的。不過令人感到無法釋懷的是，雖然戈巴契夫領導的蘇聯在一九八五年以後，已有各種政經的改革，但是却從未輕言放棄共產主義之際，布氏的共產主義敗亡論，究竟是遽下斷語或自打耳光呢？

布氏在一九六三年的「政治權力」中，對於美蘇兩國政治體系的比較，是從政治權力的觀點出發的，認為政治權力的排序，是應付時代挑戰的關鍵。而以下四點是政治權力的核心主題。一、政治理念與政治的關係，二、社會的特質決定政治體系，三、政治領導決定政治體系的力量與效能，四、政治領袖運用其力量將其價值觀與政治理念，用之於決策過程。

「政治權力」一書基於以上四個重點，對美蘇兩國詳加比較，明白指出美蘇政治體系各有其優缺點，不過其重點應該是更著重於陳述蘇俄政治體系的穩定性。書中指出蘇俄的政治理念是帶有強烈革命性的。共產政權的領導人，對於共產革命的世界性勝利，具有強烈的前瞻遠景。蘇俄的政治是一種不斷鬥爭與衝突的過程，並由衝突中逐步建立其合法性。共產主義理念的韌力，來自於它對國際關係的詮釋，與歐美民主國家的看法有着基本的不同。也就是國際關係並非國與國之間利益的鬥爭，而是將全世界視為不同利益的鬥爭，除了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外，更有國內的，社會的，經濟的，以及政治的利益。同時國際關係是一種恆動的現象，更是共產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衝突關係，在共產世界未實現之前，這種衝突、變動的情況將持續下去。

「政治權力」中認為，蘇俄是以一意識型態主導的黨，完全滲透進學校、青年組織、政治教育、大眾傳播，因此是由黨來控制全民。而另一方面，蘇俄政治體系的領導人，都必須出自於黨工，並為工農無產階級之後，他們都是一輩子從政的專業政客與官僚。唯有具有黨員的身份，才能在唯一的政治階梯上求發展。簡言之，蘇俄的政治體系是以黨為中心的一元晉用、昇遷、黨政、鬥爭，擴張國際勢力的意識型態鬥爭體。

因為蘇俄的政治體系是如此完整與自我滿足，所以「政治權力」一書為蘇俄的未來描繪了一個美好的遠景，亦即富裕的集體社會（affluent collectivism）。為了避免個人主義的邪惡，汽車、房子要共乘、共住，人們將生活在「社區宮殿」（communal palaces）中，每殿可住上兩千人，他們將一起用膳，幼兒出生後就在住校中享受幾乎全時的教育，可以享受國家所提供的各種設施，包括交通、住宅、餐點、社會服務，甚至衣服。如果這些正如蘇俄專家所預言的，在一九七五年至二〇〇〇年間實現大部份，則蘇俄的政治體系將會更具理性，更少壓制，而社會的自我節制也將增強。

「政治權力」一書甚至認為，如果蘇俄共黨能採取五項包括黨領導人採任期制等改革，則政治體系的上層結構將更具規則性與秩序，也可化除不滿的情緒。如此的政治變革，將更具有制度性，但並不必然更民主，也就是說政治體系將仍為寡頭的官僚體系。為了支持這種政治體系的非民主屬性，布、杭兩氏甚至引述 Carl J. Friedrich 的話，認為並非大多數的人都必然希望民主與自由。

這一切的討論都是布、杭兩氏對於歷史發展的詮釋，而特意避開他們對於憲政民主的私人偏好。但是他們的推論，也許正好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，也就是將政治體系視為一個自己擁有生命，而且是具有新陳代謝却又永生的生命體。事實上，正因蘇俄的政治體系與其領導階層的政治權力大小息息相關，及政治領導層與其繼承之未能制度化，使得蘇俄政治體系經常存在不可見的極大不確定性。「政治權力」一書中，有意無意忽略了蘇俄人民的價值與存在，認為他們都甘願生活在共產制度之下，和史大林的殘酷統治事實相對照，則更顯示出此種看法不合理之處。事實正如「一敗塗地」書中所詳述的，蘇俄共產暴政將人民視為炮灰與奴工，為共產世界的虛無目標，而生活在慘無人道的悲慘狀態之下。

「政治權力」書中的推論認為，蘇俄的政治體系是以黨及黨工為重心，暗示着黨工身份的不變性。事實上，書中也曾指出蘇聯的領導階層後來並非一成不變。一九一七年共產革命的前後，領袖人物都是中產階級、知識

份子，一直要到一九二九年史大林掌權之後，共黨領袖才來自農民、無產階級。單從這一事例，即可看出蘇俄政治體系的人才甄拔並非是不可變的，戈巴契夫如果要使蘇俄的經濟體系起死回生，勢必要使官僚體系重作整頓，否則以意識型態為用人標準的官僚體系，將無法有效施行他的改革計劃。

「政治權力」所主張的美蘇二元體系續存論，從表象上來看，是過去三、四十年國際政治的現況，但是就正如「一敗塗地」在二十六年後所依據的經濟論証所指陳，經濟因素已左右了共產主義的發展。經濟落後的結果，使共產主義的理論難以令人相信。而這也正是以羅斯陶（W.W.Rostow）為代表人物的匯合論所主張的，共產主義只是「過渡時期的疾病」。羅氏認為馬克思主義只適合於工業化初期的社會，通常對於世界上的開發中地區具有吸引力，但是對於高度工業化的歐美國家則少有說服力。他認為工業化的最後階段，是高度大眾化消費的階段。在此一社會中，高度集權的政治獨裁是無法維持的，因之共產主義在高度大眾消費的時代裏，很可能凋謝。他認為蘇聯的領導人必然瞭解此一問題，而將盡全力延緩高度大眾消費經濟體的來臨。不過，持續的經濟成長必將埋葬共產主義。

「政治權力」一書所反駁的匯合論之經濟決定論，在東歐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歷史中，取得了明顯的佐証。東歐大多數國家從五〇年代起，就以匈牙利、南斯拉夫為首，積極進行不同程度的經濟改革，可是改革的結果却積效不彰。民生消費品短缺、通貨膨脹高達五倍、十倍的現象普遍存在，於是東歐國家人民在經革失敗之餘，當然要求政治改革與民主化、自由化。

很諷刺的是，「一敗塗地」中布氏一反過去為共產主義漂白的說法，而全力抹黑共產主義。他說：「共產政權的現象代表歷史的悲劇。共產政權是基於不滿現狀之不公正而來的理想主義，因之它試圖找出更好、更合人性化的社會。不幸的是，它却造成大規模的高壓統治。它很樂觀的反映了對於以理性力量塑造完美社會的信念。它基於以道德啟發的社會改造主義，觸動了人性之愛與反暴政的最強烈情緒。於是，共產政權攫取了不少最優秀的人才與最俱理想之色彩的心靈，但它也犯下了本世紀或任何一世紀最嚴重的罪行。」

布氏在總結他對共產主義的國際現狀時指出，蘇聯經濟改革的失敗，已使戈巴契夫不得不將政治變革視為最優先之舉，而這一事實正反映了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性看法，亦即蘇聯體系的根本錯誤，是在於列寧式統治政權的本質。而這一看法是戈巴契夫所不敢公開表達的。布氏在「一

敗塗地」中將史大林時代的各種殘酷高壓統治真象，作了極詳細的紀錄與分析，並且強調這種統治「毫無人性」的恐怖事實，但是，這些事件在撰寫「政治權力」一書時似乎並不存在。

「政治權力」一書中認為蘇俄政治體系能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，是其意識型態為主幹的完整體系運作。而在「一敗塗地」中，則指出共黨的困境最明顯的是在信仰的領域內。由於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，蘇聯境內的公開討論已對個人所應私有而不受黨控制之個人價值、審美觀及信念等等，提出反一黨專政的挑戰。蘇俄的文化界已在公開的反抗黨的教條，而宗教也在試圖打擊無神論的共黨主義信念。這一切說明了「政治權力」所主張的以政治權力的運作來預言共產體系的自主發展性，是缺乏實証根據的。

「一敗塗地」中指出，當開放運動展開之際，從官方控制的傳播媒體到街頭巷議，呈現了十項廣泛議論，而又重疊交錯的議題，它們包括了：一、經濟改革，二、社會改革的優先秩序，三、政治民主化，四、共產黨的角色，五、意識型態、宗教與文化，六、歷史與史大林主義，七、內部民族獨立問題，八、國內對阿富汗戰爭的關切，九、外交與國防政策，十、蘇聯集團與世界共產運動。當這些問題同時湧現，並佐以人民日常生活物質匱乏的實質經濟背景時，共產主義的存亡之爭，越顯得前景黯淡。「政治權力」中認為政治體制並不一定要民主化，人民不一定爭取自由與民主的說法，在「一敗塗地」的論述中，越發顯得荒謬與愚蠢。

「政治權力」指出蘇聯政策權力集中的結果是，領導者更可能在各種可擇方案中，明快的作下決定。蘇俄領袖由於有集中的大權，如果必要時，甚至可以推翻早先的政策而改弦更張。這個事實也就造成了蘇俄的政策創新速度與頻率，都高於美國的主要原因。戈巴契夫上台之後所倡言的開放、改革呼聲，實際上也顯現了蘇俄領導人在政策更張上的莫大權力與彈性。東歐國家近年來自由化、民主化的步調加快、加大，與戈巴契夫的開放、放任是息息相關的。戈巴契夫認為社會主義的建設有着多樣性，並非是一元的規律，而每一國可以選擇適合的社會主義形式，使東歐的政治改革注入了強而有力的新血。共產主義國家紛紛進行改革，最後是否會使蘇聯本身也只好放棄共黨專政的傳統？如以蘇聯政治繼承之鬥爭傳統及政治領袖之掌握大權而言，如果戈巴契夫的改革出了任何差錯，或是無法解決蘇聯經濟的不振，則今後蘇聯共黨主政體制動搖的可能性，將仍是難以預料的。

「政治權力」和「一敗塗地」兩書對於共黨國家，尤其是蘇俄共產體制的資料收集堪稱極為細密、完整，惟可遺憾的是，「政治權力」偏重對

當時蘇俄體制的肯定，而「一敗塗地」則過份強調蘇聯體制的一無是處，立論不同，資料的佐証上，也就不免有倚輕倚重之差距。事實上，「一敗塗地」檢討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之不適用，仍然光從共產主義的實踐後果來觀察，却不願意由民主政治的優越性，及人類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天生本能來着墨。如此一來自然無法從民主與共產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比較，來深入分析共產經濟理論之忽略人性因素，而必然無法與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相抗衡的結局。

「政治權力」與「一敗塗地」不但缺乏對於民主政治原則優越性的肯定，也缺乏對於全球逐漸演變成地球村的深刻認識。羅斯陶的匯合論所言之高度大眾消費社會，在世界各國地理阻隔的時代裏，具有獨自發展的可能。然而，在衛星通訊與大眾傳播媒體普遍的時代裏，各國之間經濟生活的差距，與消費型態的示範效果，則很容易地在各國之間流通資訊。國界雖在，而各國人民心理認知與資訊取得的差距正大幅度的減少，反映在對於民主政治體系的要求上，也就必然地趨一致。八〇年代由於錄影機的製造與普遍推廣，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幾乎是無遠弗屆的互相觀摩着，政治意識的交流與衝激，更是打破傳統的籬籬。這些基本的事實，及其背後浮現的人性要求，應該才是共產體制最後敗亡的原因。